

浅谈郭象玄学思想的现代借鉴意义

张瑞涵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9日

摘要

郭象作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 其《庄子注》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玄学思想体系。他提出的“独化”本体论、个体“性分”学说、适性安命的逍遥观以及顺性无为的事务统筹思想, 突破了前代玄学的思想局限, 形成圆融自洽的理论架构。郭象玄学不仅在魏晋思想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其蕴含的个体差异性理念、万物共生思维、顺性治理智慧与精神安顿之道, 经过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后, 也具有较强的现代实践意义。本文着重探讨郭象“性分”思想所蕴含的个体差异性理念对现代企业人事管理的启示, 分析“独化”论中万物各有其位、共生相依的观念对社区生态实践的参考价值, 并考察其立足现实、安性顺命的内在逍遥思想为现代人疏解精神压力、寻求内心平衡所提供的传统哲学资源。在挖掘郭象思想合理内核的同时, 本文亦对其“性分”说隐含的社会固化倾向、“圣君”论述与现代民主法治的张力等问题加以辨析, 尝试探讨在现代语境下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

郭象, 独化, 性分, 适性逍遥, 生态实践, 精神安顿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Modern Relevance of Guo Xiang's Metaphysical Thought

Ruihan Zhang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Received: August 7,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1,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9, 2026

Abstract

Guo Xiang, a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e Neo-Confucianism in the Wei-Jin period, constructed a unique philosophical system in his “Commentary on Zhuang zi”. He proposed the “individualization” ontology, the theory of individual “nature classification”, the philosophy of “freely enjoying nature and being content with fate” and the idea of “coordinating affairs in accordance with nature and

being inactive”, which broke through the ideological limitations of previous Neo-Confucianism and formed a harmonious and coher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Guo Xiang’s Neo-Confucianism not only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ought in the Wei-Jin period, but also the idea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he thinking of coexistence of all things, the wisdom of governing in accordance with nature and the way of spiritual settlement contained in it, after being creatively transformed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also have strong moder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 concept contained in Guo Xiang’s “nature classification” thought for the enlightenment of modern enterprise personnel management, analyzing the concept of “each thing having its own position and coexisting and interdependent” in the “individualization” theory for the reference value of community ecological practice, and examining the inner philosophy resources provided by its internal philosophy of “living freely and being content with fate” for modern people to relieve mental stress and seek inner balance. While exploring the reasonable core of Guo Xiang’s thought, this article also analyzes the implicit social fixation tendency of his “nature classification” theory, the discussion of “saintly monarch”, and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saintly monarch” discourse and modern democratic rule of law, and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paths for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 the modern context.

Keywords

Guo Xiang, Individualization, Nature Classification, Xiaoyao According to One’s Nature, Ecological Practice, Spiritual Settlemen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对一个组织而言，如何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上，是一个既古老又现实的问题。无论是对于一个公司的管理，抑或是对一个大型组织的内部运营，都需对于个体的把握的敏锐的洞察力；而对于现今社会的快节奏生活，对于人们个体精神状态的关注也越来越得到了重视。这些问题看似分属不同领域，但在作为魏晋玄学集大成者的郭象思想体系中，它们可以通过“性分－独化－逍遥”的概念链条获得一种贯通的审视：从正视个体差异，到理解万物的独立价值与相互依存，再到在现实中安顿自我，郭象提供了一条从认识论到实践论的完整思路[1]。本文尝试从这三个概念出发，分别讨论它们在现代企业人事管理、社区生态实践和个人精神调适三个具体层面的当代启示，并在借鉴的同时保持对其思想局限的清醒认识。

2. “性分” “无为” 思想对现代企业人事管理的借鉴意义

要谈郭象对于管理方面的借鉴意义，我们要先了解郭象的非常核心的思想之一：对于“性分”的观点。先秦时期对于人性的思考是讲究人性的共性，无论是性善还是性恶，都是对人性生来就是什么样的的一种论述和观点；西汉的董仲舒则提出“性三品”的观点，将人性分为三等进行区分；唐朝的韩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性三品”“情三品”提出人不仅分为上中下三等，每一等分别对应着善、可导上下和恶三种情，但这些所有的中国古代对于人性的思考都是聚拢性的，是范围扩展到人类这个群体的，是属于极具概括性的对人性的理解，而郭象对于人性的理解，不再单单是对“性”的概述，而是扩展到“性分”，给人性一个量化，表达的是对每个个体的关切[2]，当每个个体的关切被量化限制后，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个体的差异性[3]。郭象认为：“夫大小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

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4], p. 8)。这就是说，在合适的环境中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本性和本分，都应当按照其本性而为。又如举例“夫大鸟一去半岁，至天池而息；小鸟一飞半朝，枪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则有间矣，其于适性一也。”([4], p. 6)。大鸟可以一飞就是半年，到天池处就停止；而小鸟一飞是半天，在树枝上停止。这两者是有很大的差异，而这则是因为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性分的缘故。郭象又用“大物必自生于大处，大处亦必自生此大物”([4], p. 5)来进一步证明了自己所说的每种物体、每个人都有其各自的性分，做任何事都是应当符合自己特有的特点的必要性。

需要辩证审视的是，“性分”学说诞生于门阀士族垄断资源、阶层高度固化的魏晋时代，其理论底层暗含着对先天身份等级的合理化论证，本质上是服务于世家大族维持阶层特权的现实需求，将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归因于先天“性分”，带有浓厚宿命论色彩，存在遮蔽阶层矛盾、弱化社会公平诉求的固有缺陷。若要在现代语境下完成创造性转化，必须彻底剥离这套先天身份预设的阶级外壳，仅保留尊重个体禀赋差异、倡导人尽其才的合理内核，把古代“先天注定的身份本分”重构为现代语境下对个体能力、性格、特长等客观差异的理性认知。以下所讨论的“性分”，均在这一经过转化后的意义上使用。针对个体中存在差异性，郭象进一步说：“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事，其济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生，而营生于至当之外，事不任力，动不称情，则虽垂天之翼不能无穷，决起之飞不能无困矣。”([4], p. 10)。因为人各有其性分，所以每个人应当在自身的本性之中进行限制，在自己的本性中做自己力量所至的事。

在将上述思想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之前，有必要先回答一个问题：与既有的管理理论相比，郭象的“性分”思想到底提供了什么独特的东西？儒家的“因材施教”([5], p. 58)虽然也关注个体差异，但其最终指向的是统一的礼乐人伦标准，差异只是通往同一目标的起点而非终点；现代西方人力资源理论以企业生产效率为核心目标，对员工差异的关注本质上是工具性的——适合做什么，取决于什么能为企业创造最大价值。郭象“性分”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从本体层面承认了不同禀赋的平等价值[6]。技术、管理、服务等不同方向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每个个体在其性分之内都可以达到自身的完满。这一价值立场是中西常规管理理论均缺失的，也是搭建多通道人才体系不可替代的理论支撑。

落实到具体的企业管理实践中，这种思路可以转化为几条明确的操作原则。首先，在员工的职务安排上，管理者应当尽可能了解每位员工的特质，选择适合的人放到适合的岗位上，不强求员工在不匹配的职位上工作。其次，管理者应当充分认识和发挥每位员工各自的长处——一个人的短处可能在另一个岗位上恰恰是优势，各取所需、扬长避短，才能让各个部分都成为精华，达到功效合一的效果。例如，国内华为、高端精密制造企业已落地的人才双通道机制便是典型实践。资深研发人员无需被迫转向管理序列，依靠技术职级即可获得对等薪酬、资源与发展空间；擅长实操的技术工作者拥有独立晋升路线，不必参与行政竞争，这完全契合郭象“各当其分”的内核——不是所有人都要走同一条上升通道，每条通道上的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性分之内做到最好。这种模式能够从内在层面强化员工的职业认同感与工作投入度，优化企业内部氛围，提升整体运营效率。

关于郭象的“无为”思想，也需要一并讨论。郭象提出“无为而治”，但他所说的“无为”并不是庄子、老子所提出的无所作为，而是依赖于他提出的性分思想。“率性而动，故谓之无为也。”([4], p. 156)——在自己本性范围内活动，就可以称之为“无为”。郭象认为国家需要一个治理主体，而他设想的理想治理者是“明王”“圣君”。必须明确指出，这一主张是魏晋君主制背景下的产物，依托的是贤人政治的传统逻辑，与现代民主法治的基本理念存在根本冲突，不能直接套用于当代语境。郭象由“性分”推导出的“圣人治、臣民从”的等级框架，恰恰是其思想中需要被彻底扬弃的部分。我们今天能够从中剥离出来的合理因素，仅限于治理者应当有自知之明、在自己的能力边界内行事、尊重制度分工这一朴素的启示，而不涉及对任何特定治理人格的预设。

总而言之，郭象的“性分”“无为”思想适应了当时门阀士族的社会结构，而其中所包含的尊重个体差异、顺应规律施策的普遍智慧，经过批判性的改造和转化后，对我们现代企业的组织人事管理仍然具有借鉴意义，非常值得根据当代社会的具体情况进行吸收和改造。

3. 独化论对社区生态实践的借鉴意义

在郭象之前有很多的魏晋玄学家对“有”和“无”的关系进行分析。同为魏晋时期玄学家的王弼就有：“无”是一切“有”的来源这样的观点，但郭象却批判了前人的思想，说：“世或谓罔两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4], p. 32)。依次推断出我们设定的普遍的本源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并且以此进一步提出：“无”不仅不可以生“有”，“有”同时也不能生“无”两者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关系可言，对此提出了他的“独化”论。在他的“独化”论思想中共有两条内容：一是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都是自然而然的，不依靠他物的；二是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都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干而突然发生的([1], p. 186)。然而就其第二点来讲，是就万物的个体来讲的，主要强调的是每个个体的独立性，每个个体都具有各自的独特价值，因而每个个体都是拥有自己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必要性的，是缺一不可的。对这个观点，郭象同时也强调虽然万事万物就个体来讲是偶然的、独立的，但就整体来讲它们却又都是相互之间不可或缺的。虽然万物都是“自生”“自得”“自造”“自有”([4], p. 31)的但在世界整体上都有其特定的位置，都是不可以被忽视的，少了任何一个，位置就会空缺，就会造成世界整体的不平衡。

相较之下，老庄“道法自然”([7], p. 64)将万物价值依附于本源之“道”，强调人类保护自然是个人循道的道德义务，而儒家“天人合一”([8], p. 24)以人伦秩序约束人与自然，核心是服务人类社会伦理，二程则以“天人本无而二”强化其本体依据([9], p. 256)；现代环境经济学以资源可持续利用、经济收益为环保出发点，均把自然视作依附人类的客体。郭象独化论直接赋予所有物种独立自生的内在本体价值，环保行为不再服务于人类利益或道德规范，而是尊重万物自身存在的自性，提供了区别于所有传统、现代环保理论的全新伦理根基。

据此，这就不得不令我们思考：当今社会，由于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连年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虽然获得的材料促进了世界工业化进程加快、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时我们人类却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近年来接连的自然灾害、由于人为的破坏带来的生态的不平衡，很多也已经危害到了人类的生存，这才使我们意识到，人与自然是应当建立起平衡、健康的关系。而郭象的“独化”论就已经说明，自然万物乃至人类，在整个世界整体中都是一个又一个的个体，将世界比作身体，那么自然万物就是身体中的内脏、四肢、关节，每个部分都有属于它各自的独特位置和功能，一旦某一方面被破坏，必然导致整个身体的不平衡和不协调，最终一定会影响到其他各个机能的运转，所以当我们现代人为了获取上好的木材做成家具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乱砍乱伐，又或是为了满足人们愈发膨胀的欲望而随意捕猎穿山甲或是其他的动物，造成越来越多的物种灭绝，都会必然的导致整个生态的不平衡，而其造成的危害，也必将危害到人类的生存安全和健康。

落实到具体的生态保护实践中，“独化”思想可以提供两条可操作的实践路径：其一，在生态修复工程中尊重物种的自然本性，减少人为过度干预。例如在矿山修复、城市绿化项目中，优先选用本土乡土植物，依靠植被的自然演替形成稳定的生态群落，而非强行引入外来物种打造人工景观，这正是顺应万物“自生自化”本性的体现。其二，在社区层面的环保实践中，重视微小物种的生态价值。比如在城市社区绿地中保留原生草本与昆虫栖息地，而非只追求景观整洁，因为每个微小物种都是生态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每个个体的“独化”共同支撑起整体的生态稳定。例如，上海城市原生花园试点、浙江近自

然山林修复项目均践行该思路，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人工修剪、水肥干预，依托本土物种自然演化完成生态修复，是独化思想现代转化的典型实践案例。需要说明的是，目前一些践行类似理念的实践项目(如部分城市推行的“近自然”绿化模式)，虽非直接源于郭象思想，但其核心理念与“独化”论高度契合，可以作为诠释性关联的参照。

同时也需要辩证看待独化论内在张力：该理论既主张万物独立自生，又强调整体共生，落地实践中极易产生两种认知偏差。一是易片面地放大个体独立，认为生态保护应当完全放任物种自由演化，放弃濒危物种人工救助、生态系统统筹治理；二是易过度追求整体统一，“一刀切”地改造自然环境，抹杀物种自性。化解二者矛盾的可行路径为分层施策：对于微观地块、物种层面尊重独化自性，减少强制性人工改造，而对于宏观区域、全域生态层面，就建立统一协调保护机制，统筹干预重大生态危机，实现个体独化与整体稳态的平衡。

4. 适性逍遥思想对现代个体精神焦虑的调试价值

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后，不可避免的就会对自己的精神世界有一定的追求，现代人越来越渴望内心的松弛与自足，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快节奏生活带来的持续压力。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每个人都生活在各种规则的约束之中，在遵守规则的同时，往往也需要一种内在的调适方式来释放压力、安顿自我。这很像中国古代文人们的精神追求，由于当时社会的种种原因，文人们无法通过其他途径来排解社会带来的压抑，所以寻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超脱，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和批判的反应，庄子称之为“逍遥”。

庄子认为的“逍遥”与其后郭象同样提出的“逍遥”虽然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相同，但就其本质上来讲，还是存在很多的不同。庄子所认为的“逍遥”可以说是一种纯精神上的超越，摆脱现实的，不涉及社会的秩序和管理的，是有一定的方法论，有一定的方式步骤的，是完全强调摆脱外在的，并且并非所有人都可以获得这种“逍遥”的境界的，只有庄子所认为的“圣人”是可以达到此境界获得超脱的；而郭象的“逍遥”却并不是这样的。郭象认为的“逍遥”是立足于现实的，并不是纯精神的，由于他的性分的思想，是涉及到社会的秩序和管理的，是被动地接受既定的现实的，而也是因其“逍遥”是来自于人的性分的，所以是没有具体步骤的，只有一步，即依照自己的性分，并且也因为如此，郭象的“逍遥”就必然是没有特定的某种人的，是所有人都可以达到的，并且是完全内在的。郭象说：“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极，循而直往，则冥然自合”([4], p. 28)。“至理之极，但当冥之，则得其枢要也”([4], p. 29)。郭象认为，事物只要顺其自然就可以达到“冥然自合”，而“冥合”的关键在于“忘己”，就是达到物我俱忘，一切都忘的状态，这就是达到了“逍遥”的境界。

客观来看，无论是庄子还是郭象的“逍遥”思想，都带有一定的消极理解倾向：二者都侧重于对现实的顺应与接纳，缺少对现实的主动改造与突破，若片面理解容易滋生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消极心态，这也是学界普遍对其有所批评的原因。因此我们在借鉴时需要明确辨别、主动规避的消极内涵。即便存在或多或少的理论短板，但适性逍遥的思想依旧能够为现代社会的精神内耗提供调适思路。当下，城市化进程加速，内卷、同辈攀比、35岁职场危机、单一成功评价标准持续加重大众心理负担。若以郭象适性思想作为调适视角，可建立与现实和解的内在方向。每个人都拥有专属的禀赋天性，明晰这一点，那么事业、家庭、人际各类事务等就不必强求超出自身承载力的结果；同样，社会中多数客观环境无法依靠个人完全的进行改变，个体可以在客观现实框架内寻找内心的平衡点。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需要明确“顺应性分”与“消极躺平”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安守自身禀赋并不代表放弃自我成长，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强调人们不违背自身特质强行追逐不匹配自身的目标；充实自我也不等于无限地放大自我欲望、盲目的攀比，而是强调在自身能力边界内深耕所长。可见，现代语境下

的适性逍遥，是尽力而为后坦然地接纳一切结果，绝非逃避奋斗、安于困顿。这种与现实和解的心态，不是屈服、逃避现实，而是主动适配现实、掌控自身心境，帮助个体在繁杂生活中获得内在安宁，立足自身禀赋实现独特的个人价值。具体到日常生活中，这种“适性逍遥”的思路可以落实为两种调适方法：一是跳出单一的社会评价标准，放下无意义的攀比焦虑，专注于自身的节奏与目标，接纳自身的禀赋边界，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深耕，而非强求所有人都走同一条成功路径；二是在尽力而为的基础上放下对结果的过度执念，在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中专注过程、依本心行事，通过降低对外在认可的过度依赖，获得内在的安宁与自足。

5. 结语

综上所述，郭象以《庄子注》为载体[4]，融通老庄思想并加以创造性阐发，建构起以“独化”为本体、以“性分”为内核、以“适性逍遥”为归宿、以“无为而治”为实践路径的完整玄学思想体系。其思想跳出了传统玄学有无之辩的固有框架，既强调万物各自独立自生、自性自足，又肯定世间万物相依共生、不可割裂的整体性关联，兼顾个体价值与整体秩序、自然本然与社会人伦。

从现代价值来看，郭象“性分”与“无为”思想，经过批判性转化后，为现代企业人事管理提供了因才任能、顺性施策、各司其职的治理思路；其“独化”论中万物各有其位、共生共荣的理念，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维系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提供了古老而深刻的哲学启示；而区别于庄子超然出世的逍遥观，郭象立足现实、安性顺命的内在逍遥思想，也为快节奏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纾解精神焦虑、调适身心状态、实现精神自足与心灵安顿提供了重要修身路径。

需要明确的是，郭象思想诞生于魏晋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中，其理论在三个层面上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时代局限：其一，“性分”学说隐含的等级预设和宿命论倾向，与现代社会平等、开放的基本价值存在根本冲突；其二，“圣君”“明王”的政治构想依托于贤人政治的传统逻辑，无法兼容于现代民主法治的制度框架；其三，“适性逍遥”对现实的顺应取向，如果缺乏批判性审视，容易落入消极避世的思想陷阱。本文对郭象思想的借鉴，并非直接照搬，而是在明确辨析上述局限的前提下，剥离其时代性的消极外壳，提取其中尊重个体差异、肯定万物内在价值、寻求内心平衡等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智慧，使之适配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总体来看，郭象玄学并非局限于魏晋时代的思想遗存，其中蕴含的治理智慧、生态理念与精神修养之道，跨越时空仍具有鲜活的现实生命力[10]。合理汲取、创造性转化郭象玄学的思想精华，能够为破解现代管理难题、维护万物各安其位的生态秩序、培育现代人健康精神世界提供丰厚的传统哲学支撑。

参考文献

- [1]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 中国哲学史[M]. 第二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2] 张云起. 彼我与分限: 再论郭象的性分概念[J]. 哲学研究, 2026(2): 79-89.
- [3] 耿加进. “适性”与“无为”——郭象的管理思想[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4, 29(2): 73-77.
- [4] 郭象. 庄子注[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8.
- [5]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6] 吴宁宁. 郭象“性分”思想的重重解读[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22(6): 59-64.
- [7]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 王弼, 注, 楼宇烈, 校释.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8] 张载. 张载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 [9] 程颢, 程颐. 二程集[M]. 《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九.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256.
- [10] 汤一介. 郭象与魏晋玄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